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课题批准号：2001FZW003

全 球 化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对策研究

课题负责人：李延文

课题组成员：梁海磊 包建铎 徐 展 韦文珂
赵哲训 方作延 刘长胜

二〇〇二年九月

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对策研究

目 录

- 一、全球化的由来与发展趋势及其评价1
 - (一) 全球化的由来1
 - 1、什么是全球化.....1
 - 2、全球化的发展阶段.....1
 - (二) 对全球化的认识与评价3
 - 1、全球化的实质和目的.....3
 - 2、对全球化的认识.....3
- 二、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7
 - (一) 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心理文化的影响8
 - 1、民族精神8
 - 2、道德规范9
 - 3、社会信仰11
 - 4、思维方式12
 - 5、价值观念13
 - 6、艺术文化15
 - (二) 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的影响17
 - 1、建筑文化17
 - 2、服饰文化19
 - 3、饮食文化20
 - 4、日用器物文化21
 - (三) 全球化对汉语的威胁21
 - (四) 全球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23
 - 1、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23
 - 2、信息网络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23
 - 3、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24

三、我国民族文化应对全球化的对策	24
（一）必须融入全球化的潮流	24
（二）致力于建设一种先进文化	25
（三）妥善解决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	26
（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的全面提高	26
（五）强化文化安全意识，维护文化安全	27
注释	27
参考文献	29

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对策研究

进入21世纪，全球化问题在极少数超级大国的操纵和炒作下，似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如何认识和应对这一潮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全球化的由来与发展趋势及其评价

（一）全球化的由来与发展

1、什么是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有一个通行的定义：“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1]这个定义同实践中生产要素和资源由发达国家无拘无束地向发展中国家单向流动难以契合。因此，我们赞同罗天虹的观点，即所谓全球化，本来指经济全球化，意为全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其最初的意义应是指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联系的增加和逐步密切，并发展到互相依赖。它是指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赖日益密切、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和全球一致性的因素不断增长这一现象、过程和发展趋势。^[2]

由此可见，全球化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①经济全球化，又包括②技术全球化、③民主和人权全球化（以上是《美国国务院1999年人权报告导言》的观点）。此外，还应包括④文化全球化。

2、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全球化的发端于何时？是怎样发展变化的？目前学者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费孝通先生引述的三个阶段的说法：

（1）全球化应发端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航海技术克服了海洋障碍，人类的洲际交往成为可能，加上后来以机械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使西方那些生产力先进的国家向世界各地扩张成为现实。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拓展和向亚非国家的殖民活动是全球化过程开始阶段的根本特征。此后，到19世纪70年代告一段落。这一阶段，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试图把西

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逐渐确立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地位。这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2)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崛起并长期保持着生产力领先的发达国家地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在美国维持的经济秩序中，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资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种种空间障碍，经济交往的规模和频次大为提高并促进了经济组织的革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生产要素和世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所谓“国际惯例”即市场上共同“游戏规则”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贸易交往制度上的反映，是与经济活动伴生的文化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模式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了许多后起国家模仿的对象。

(3) 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直到现在，且在继续发展。这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霸权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并在事实上将逐渐淡出中心地位，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以及驱动力呈现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的新兴力量纷纷登场，走向前台，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分量和参与权利。在这种多元化格局里，许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已超出国界，所以，全球意识、全球纲领、全球行动等越来越多地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自觉的追求。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为主导的局面，正在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强大趋势。这是包括中华民族、炎黄文化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所共处的历史阶段。^[3]

上述阶段划分，接近于有学者提出的“19 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观点（[英] 哈米什·麦克雷语）。但费孝通先生大约也是有所保留，对此我们基本赞成。对于第三阶段的认识，需要加以说明。这里表明了除美国霸权文化圈之外的文化学者的一种觉醒，一种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力求文化的多元化，致力于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抗拒美国的单一的文化霸权。这种认识是符合全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文化的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互动才是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对此，我们完全赞同。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从二战以后所取得的霸权地位的稳固性。事实上，美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利用自身的优势，逐步强化其霸权地位，政治上对联合国的控制和不断施加压力，经济上通过对国际经济组织规则的制定来确立它的主导地位，借助科技优势抢占全球科技的制高点，利用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优势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充当国际警察。诸多事实表明美国并未“淡出”国际霸主的中心地位，而是不断采取措施强化这一地位。德国《明镜》周刊编辑马丁和舒曼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陷阱，是经济掩盖和政治设计共同营造的文化陷

阱，而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正是一——美国。他们指出：“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1]在 21 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复杂而又混乱的局面中，美国只是由于经济的强大，而成了“最终秩序因素”。事实已经反复证明此说的正确性，美元确实已成为国际武器，美元汇率也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判断标准，甚至于连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微软和 IBM …… 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商标或全球化标准的一部分，成了一种宰制性的权力，一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可见，在这场全球化的游戏中，美国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还是主裁判，同时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所以，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是“第一个能从全球化陷阱中逃脱出来的也是美国政府”^[3]。

因此，我们认为在第三阶段，美国要借助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强化其政治影响力和文化渗透力，力图保持它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正在崛起，民族主义、本土文化将与之相抗衡。至少在 21 世纪这百年内，美国仍将是不可忽视的超级大国，美英所倡导和主导的全球化潮流，仍将是全球各国、各民族和各种文化难以摆脱的发展趋向。

（二）对全球化的认识与评价

1、全球化的实质和目的

进入 21 世纪末叶，市场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成了人类世界唯一可能或现实的选择，不可抗拒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诸如世界性市场、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全球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运用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所向披靡的迪斯尼和好莱坞文化；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所代表的快餐文化；以及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与道德价值理想）的汇合，营造出让入确信不移的“新全球主义”景象，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相信“普天之下皆是如此”。^[6]

全球化就是：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和便捷的金融交易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的市场。这种全球化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其引导和推动者及规则制定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放大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不公平原则，导致了国际投机猖獗，并为西方资产阶级向全世界推行其思想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2、对全球化的认识

归纳国内思想界、理论界关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和认识：

一是无条件地参与观。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都将使每一个国家与“国际”接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因此，面对全球化首先要克服思想上的僵化，更新观念，积极参与国家间的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学会按国际惯例和国际社会的规则办事，把自己融入国际社会。

二是认为全球化遥遥无期。认为全球化本是指经济现象，对其他领域将会产生影响。但经济全球化不一定能导致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多样化依然存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并没有到来，而且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未来。我们不必惊慌失措。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将对各国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融入这一潮流是大势所趋，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是利弊共存。

汤一介先生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加剧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7]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相继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消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使得大多数国家休养生息，致力于经济建设，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贸易交往；同时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尤其是科技产业化长足发展，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之愈益频繁和直接。

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的论点开始出现。西方某些超级大国看到了这一论点对其自身利益的潜在作用，就推波助澜，大力炒作，使“经济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西方的一些理论家借助他们的传播优势，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西方中心论”死灰复燃。被人称为“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即持此观点（详见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

与此对立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汤一介先生称之为“部落主义”），他们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极为珍视本土文化传统，反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持决然排斥态度。

从对文化的碰撞的认识上看，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其一是同化观。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全球化的文化特征就是文化同化趋势的出现。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墨子刻说：“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与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不仅在追求物质繁荣所需的工具价值和机构上，而且在各种政治和文化模式上也日趋相似。”

其二是多元文化观。著名文化学家汤一介先生持此观点，他说：“我们必须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民族、各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人们应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多元的新格局。”他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观念，即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两三千年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8] 汤一介先生认为，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呈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若干个重要的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和中东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及以色列和散布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等。这几种大的文化潮流将会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但是与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相比，又有三方面的不同：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因而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二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三是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9]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在华约垮台、苏联解体、两大阵营的对抗（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儒教即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显然这也是一种多元文化观。他深入论述了西化的不可能性，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他看到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看来似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来越强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强调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由于“西方价值的悖论”，正是全球

化带来了民族主义，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各种宗教（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的复兴。^[10]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对全球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化带来相当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像有学者论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文化向发展中国家的涌入并得到那里的普遍接受，“只是文化的表层，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如果民族的价值观未变，这种文化同化现象只不过是一些泡沫，丝毫不能动摇民族文化的存在。”^[11]我们认为，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基础。第二，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不可低估，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第三，文化同化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少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从广义上讲，文化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文明的涵义接近，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狭义上讲，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各种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每一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是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之时，世界各种文化也呈现出某种全球化的交融趋势。

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就作过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式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编者注）”^[12]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经济）和精神生产（文化）的联系，以及各民族文化的共性所作的论述，可以想见，他们对经济与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有着多么清醒的认识，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证实了他们的论断，足以说明其论断的前瞻性。

经济、政治、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现实的，强行将其分离开来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表现。西方经济学讲四大支柱：第一是技术；第二是天赋，就是人的素质；第三是偏好，实际上是新的潮流；第四是制

度。这四大支柱其实都和文化有关，其中的天赋、偏好、制度更是和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已经较好地解决了文化和经济的结合问题，譬如美国开辟中国市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进来了，IBM、因特网进来了，摩托罗拉、波音进来了，耐克、乔丹进来了，大量的电视、电影进来了。他们的商品进来的同时，他们的服务进来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也进来了。花木兰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优秀题材之一，被美国人制成电影介绍到中国来，那种带有异国风情和思维方式的全新演绎，令作为“娘家人”的炎黄子孙们大饱眼福，从而使美国的《花木兰》在中国风靡一时。同时它还有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商品和服务，使文化与经济真正做到一体化。

然而，我们却有一种相当具影响力的观点，不同意经济全球化会带来文化全球化。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建立在资本、技术、产品、市场、生产和通讯一体化之上，而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经济的要素，所以，全球化就是经济的全球化。从而把全球化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叫做“经济全球化”或“经济一体化”。反对“政治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这样的特定概念。认为政治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倡导政治和文化等的全球化将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的政治价值和传统文化。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翻版。从我国历史上看，一直是把“崇高的”文化与“功利的”经济严格区分开的，而且褒贬分明。文化（理想、伦理、道德等）是形而上的，是君子、贤哲的毕生追求，经济是形而下的，是君子、贤哲所不屑的，是“奸商”。在这种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影响下，认为经济、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泾渭分明，不可混淆。这种认识显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社会实际了，是落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今天的世界。事实上，随着经济生活的全球化，政治和文化将与之贴近，或多或少或迟或早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也有政治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我们说的同质化趋势，不是指政治和文化的完全同一，而是指各国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将日益增加，相应地，各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交往也将前所未有地增多。一些普遍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机制将日益受到各民族国家的重视，一些普遍的政治规则将日益具有真正的国际性。

二、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系统与成果构成了物质生产文化；在人与社会的系统中，人类建立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规范的系统与成果构成了制度行为文化；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主体意识的创造活动的过程和成果，构成了精神心理文化。本文着重从精神心理文化、物质生产文化、语言（汉语）和国家安全四方面分析探讨全球化的影响。

（一）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心理文化的影响

精神心理文化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它所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潜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

精神心理文化又可分为与制度文化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和与风俗习惯行为文化相对应的社会心理文化。①意识形态层次包括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基础意识形态和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更具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②社会心理文化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社会形态下长期形成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是风俗习惯等行为文化的内在方式。它特别表现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宗教情感和审美情趣的不同。

精神心理文化内在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它长久地积淀于各民族文化深层，构成各民族的独特心理结构。一般认为，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13]，“最难于发生变化”^[14]。这种观点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使人们误以为精神心理文化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结构，很难产生变化。我们认为不然。

这里我们着重从民族精神、道德规范、社会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分析全球化对中华民族精神心理文化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变化。

1、民族精神

庞朴先生认为，“忧乐圆融”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所谓‘忧’，展现为如临如履、奋发图强、致君尧舜、取义成仁等积极用世态度；所谓‘乐’，则包含有啜菽饮水、白首松云、虚与委蛇、遂性率真之类的逍遥自得情怀。”“圆融是统摄忧乐又超越忧乐的境界，是儒道各自学说的最后一言和最高境界。”圆融也是一种优势，它使得中国文化能顺利迎接外来的佛学，不因它的迷狂和辨析而盲从和自馁，相反却以圆融去容纳和包涵，论证和充实，并终于汇成了源远流长、雄峙东方的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神。^[15]

这种“圆融”，与有些学者所讲的“和谐”是相接近的。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6]是对和谐精神的简要概括：和谐就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和谐就是厚德载物，兼包并蓄。

文化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三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人与

自然方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把自然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在人与社会方面，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互尽义务；在人自身方面，强调内心世界的和谐，提倡对人的欲求予以道德的节制。由此，不难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这种和谐观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正是因为它较集中地体现了民族心理素质，注重处理解决上述三方面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才能够居于世界前列长达数千年之久，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延续至今而未中断的文化。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一核心精神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解构了。我们仍然从文化的内容这三方面来考察：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丢弃了传统的和谐观，去向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竭泽而渔，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如西北某些地区为了地方和个人利益去挖发菜、挖虫草、挖甘草、挖麻黄，严重毁坏了地表植被，使土地荒漠化加速；不加节制地滥砍滥伐，导致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江河湖泊的水质污染和大气污染，直接影响了人的身体健康。而西方人对环境的保护，对自然资源的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等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反思。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情淡化，人际关系淡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从重情讲义逐步转化为物质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见利忘义，见死不救，见义不勇为，缺乏诚信，欺诈行为盛行。商界流行的“宰熟”现象，足以让我们借之而窥见整个社会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在处理人自身的内心矛盾方面，中国文化讲求“修身”、“自省”，倡导个人品格的自我完善，使人们倾毕生精力去追求的是伦理道德的完满，而不是追求身体自然欲望的放纵。精神的追求高于物质的享受。这些传统观念与今天的社会现实已经相去甚远。国人道德素质之低下，官员腐败现象之普遍，公务员权钱交易之盛行，工作之极端不负责任，诚信之严重缺失，等等等等，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片面地接受了西方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种结果，恰恰使我们与所从学的西方背道而驰。过去我们把精神享受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西方则相反，偏重个人欲求的满足；而今天，我们却矫枉过正。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为我们追求感官的享受提供了物质条件，我们的许多人要弥补过去的缺失，视物质享受为最大幸福而不再关注精神需求，挥金如土，奢靡无度。然而西方人却仍然在“按既定方针办”，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并重，过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我们像暴发户一样粗俗不堪。

2、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或者叫“崇德”型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以血

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家族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正如孟子所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7]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这是形成中国文化重伦理、倡道德的根本原因，也使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变成了对家长权威的无条件的伦理服从。即梁淑溟概括的中国社会政治观的核心是“孝的文化”，“父为子纲”是根本，“君为臣纲”、“夫为妻纲”都是从“父为子纲”衍生来的。

这种“忠孝原则”推广开来，用以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的道德原则是“能近取譬”。即“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能做到这些，就达到了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睦共处，和谐统一，从而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大治。然而，怎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奉行这种“忠孝原则”呢？

我们的先哲们研究发明并倡导了一种道德修养观，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提出了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圣人。怎样达到这一境界？只能是终生“修身”，不断提高道德素养，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止于至善”。这种道德修养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这种修身观是“普世”的，不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是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如此，绝无例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0]。个人修养到道德完善的境界了，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确妥善处理家庭和社会事务及各种关系，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的良好风尚和美满局面。第二，在治理国家方面，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特别重视“内圣外王”之道，即在政治上要求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孔子极力宣传用道德手段治国安民，才能真正管理好国家。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强调用道德来教育人民，感化人民，用礼来约束他们，不仅能使之守法，还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觉，心悦诚服地守法遵礼，知耻从善。第三，对执政者（国家官员）来说，有更明确、更特殊的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3]。孔子反复强调执政者本身的道德修养，是因为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状况，直接影响其执政的权威和政令的推行，所以，他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曾经为西方人所钦羡不已。莱布尼茨说：中国人“在其庞大的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成效比较团体的创始人在其小范围内所达到的要大得多。他们极为尊长、敬重老人。孩子对父母双亲的关心与敬奉犹如宗教

礼节，即便是因一言一语而伤害父母感情的事情在中国也几乎闻所未闻，……同辈之间或者相互关系不深的人们之间也都彼此尊重，礼貌周全。”他们“较之其他的国民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还把中国人与西方人作了比较，认为“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准则考虑得何等的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得多。”^[24]

然而，当社会发展到全球化的世纪之交时，中国国民的整体道德素质明显下降，而且降到了一个临界点。突出的表现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25]我们觉得重要的问题是：官员腐败成风；普遍的缺乏责任感；普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是非善恶界限混淆；信用意识缺失；拜金主义泛滥；低级庸俗充斥。有人说，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的国民，却要用“请、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这十字文明用语教育启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真是一针见血。这些道德问题的出现和发展，应当说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时候，忽视了文化建设；外因是开放后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我们的一些人难辨良莠，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社会成员整体的道德滑坡。

针对道德建设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于2001年10月25日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社会信仰

信仰是人的精神寄托和支柱。一个人没有信仰就会萎靡不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信仰就可能失去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但我们有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以儒、释、道思想为主体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这一套伦理规范虽不是宗教，但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中，起着类似宗教的凝聚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外国学者把它称为“儒教”。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作为凝聚和引导中国公民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

当社会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当中国确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

候，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许多人在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被解构、切身利益受到冲击时，感到无所适从，茫然无绪。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互联网和无线通讯的普及带来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蜂拥而入，许多人在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中，逐渐动摇了固有的社会信仰，思想上出现了混乱。一些人放弃了思想的防线，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特别是政治信念丧失，给西方敌对分子的入侵造成可乘之机。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给我们敲了一记沉重的警钟，让我们不得不正视、重视这个问题。

4、思维方式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如下特点：

第一，内倾性。中国古代那种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个体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相互隔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种关系的写照。但是，在大一统的封建体制的控制下，中华民族成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以调和、一致、融合为宗旨。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注重社会治理、安定，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形成了一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外向性缺乏。

第二，求同性。大一统的社会结构要求整个社会在组织机构和信仰观念方面同步化。儒家思想凭此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强有力地调节着社会 and 个人的思想意识。使思维方式缺乏求异性、发散性。

第三，循环性。中国传统的螺旋式的曲线思维方式，使它具有因循、模仿、重复的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富有深沉的历史感。古人不断地引证“历史”，把历史作为指南、准则、教科书，用来指导和规范现实。这种注重循环、重复的习惯思路，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前后相承的极强的亲和力和稳定性，缺乏创新性。

第四，稳定性。这与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是同价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善于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科学规范而变化。如近代以笛卡儿、培根的哲学思想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为规范的理性模式不同于古代，而现代的量子力学、相对论为规范的理性模式又是对经典力学模式的否定。世界五大文化系统，唯有中国没有被打断过，对传统的因袭造成了思维方式的历史惯性，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稳定性的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抗变性、保守性，但缺乏进取精神。

第五，直观性。中国传统的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

满足于通过知觉得到一个总体印象，而不习惯做周密详细的分析。这种直觉思维、类比思维，偏重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缺乏思想的深度。当西方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严密的几何学的培育下，养成了严密推理、讲求逻辑、追根究底与抽象思维的习惯，创立了科学技术并推进其发展进步时，中国人凭诸子百家的著作和世界上最发达的历史学，养成了专注具体对象、直觉领悟发达、善于类比推理的特点。

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方面的上述特点，使我们与西方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其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之一，是严重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爱因斯坦曾评述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德几何），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26] 爱因斯坦的惊奇实际上是感觉不可思议：古代的中国人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体系，为什么在科技发明创造方面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2000多项领先于欧洲？（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认为这并不值得惊奇，爱因斯坦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古代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源于先哲们的卓越智慧和灵光闪现。然而正是因为我们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系统的大量的实验，才导致我们在近代科学的大门外徘徊，把近代科学的诸多领域拱手让给了西方人。

直到今天，经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历了与其他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我们思维方式中的内倾性、求同性、循环性、稳定性和直观性特征，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改变。但是，求同、求稳、重复模仿，缺乏创新和锐意进取意识，仍然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规则将迫使我们与之“接轨”，思维方式的不适应，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5、价值观念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于生活在相同环境和条件下的社会群体，有着共同认可的普遍的

价值标准，所以，在一个群体中会出现接近于普遍一致的行为定势。

价值观确立后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由于社会群体人员的更替和环境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会不断地受到新价值观的挑战，从而让位于后者，而不断地发生变化。^[27]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冲击下，正在潜移默化着。我们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来考察：

第一，认知价值取向——从唯古崇古到锐意创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唯古是法、唯古是崇就是认知价值的主要倾向，孟子提出的“法先王”的观点，是其代表。此后，传统的崇古法古观念还被经典化、制度化，以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最有力的认知价值观念。“祖宗之法不可变”成为几千年传统社会铁一般的规矩，其势力之强大，从历代改革家如商鞅、戊戌变法六君子的遭遇和命运可见一斑。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社会的结构和观念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人的创新精神得到社会的承认，求新求变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激励，并将逐渐消释固有的唯古崇古的价值观念。

第二，经济价值取向——从均平思想转向承认差别。中国传统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系统，它必须靠平衡态来维持，均平的大同世界是其最终目标，而这种思想的理论表现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经济价值取向长期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建国后一段时期内，我们提倡的“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口号，就是其典型表现。在全球化语境下，允许贫富差距的存在，这种差距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的。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极具效力。然而由于传统经济价值取向的稳定性和延时性，以及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大距离拉开（基尼系数按官方的口径为 0.417，学者们估计超过 0.45，已经接近经济学界划定的 0.5 的两极分化界限）等原因，这种承认和保护差别的价值取向，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

第三，道德价值取向——泛道德主义的危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人们的任何言行都受到道德的牵制和约束，道德的影响几乎波及所有的价值活动。这种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在“五四”时期，曾受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价值观的冲击。在全球化语境下，也受到了怀疑和否定，而且有点变本加厉地偏向一端。其中明显的偏向是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信用缺失、一切向钱看等的孽生蔓延。

第四，成就价值取向——从官本位到多元化。中国传统的成就价值取向是立德、立功、立言，而其背后的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是当官掌权。这种官本位的单一的成就价值取向，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终生为之努力或以此作为生存和家族延续的梦想。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成就价值取向是行行出状元，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观直接冲